

飞行器珍藏的诉说



从本期起，将带大家走进世界各地著名的航空博物馆，走近这些珍贵的飞行器藏品，了解它们的身世和传奇，让它为我们诉说那些动人的航空故事。

文 马逸

在航空史上，莱特兄弟是动力飞行先驱，而德国的奥托·李林塔尔则是滑翔机的先驱。李林塔尔出生于1848年，比他小一岁的弟弟古斯塔夫自幼就梦想能像鸟类一样飞翔。李林塔尔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从鸟类飞行中获取各种数据，制造了大量的扑翼机模型。19世纪70年代，他通过研究和试验证明了弯曲的机翼截面比平板形的机翼截面具有更大的升力。从1891

李林塔尔的滑翔机



年至他1896年去世，李林塔尔用16种不同构型的滑翔机进行了近2000次飞行试验，包括单翼滑翔机和双翼滑翔机。1896年8月9日，当他在进行一架单翼滑翔机试飞时，突遇大风，使滑翔机在15米的高度失速并坠地，造成李林塔尔重伤，并在第二天不幸去世。这架李林塔尔制造、飞行过的滑翔机是现今仅存于世的6架中的一架，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珍藏。这架飞机制造于1894年，美国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

斯特于1896年购得。1896年，在赫斯特的资助下，该滑翔机在纽约进行了试飞，曾轰动一时，极大地增加了他的《纽约日报》发行量。后来《丽都》杂志主编约翰·布里斯本·沃克买下了该滑翔机，并于1906年2月2日将其赠送给史密森学会。史密森学会于1906年和1928年，对这架滑翔机进行过一些小的翻修。1967年该滑翔机得到了完全修复，只是其水平尾翼不是原有的。史密森学会把这架滑翔机放到了它属下的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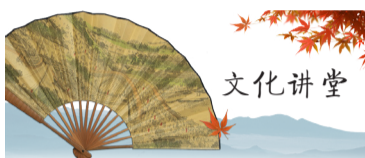
& 莱特兄弟的风筝



世界航空先驱奥维尔·莱特和威尔伯·莱特两兄弟从小就对飞上蓝天充满了兴趣和向往。而到了1896年，当媒体广泛报道著名的滑翔机先驱奥托·李林塔尔发生了致命的坠机事故之后，莱特兄弟俩才开始真正严肃地研究飞行。他们阅读了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威尔伯还在1899年5月30日给史密森学会写信，向学会索要所有航空方面的出版物。

在获得了史密森学会寄来的资料后，1899年夏天，莱特兄弟便开始着手制造他们的飞行器，这是一架翼展为1.5米的双翼风筝。制造这个风筝的目的是为了验证一套操纵系统，他们打算将这整套操纵系统用在一架全尺寸的滑翔机上，而这套系统后来成功地应用到了莱特兄弟制造的动力飞机上。

莱特兄弟想通过朝相反方向扭转或弯曲翼尖，使滑翔机得到气动平衡。这是使用一串连接在机翼外侧边缘的操纵线来实现的。这个想法提供了一个在三维空间里对飞机进行有效操纵的手段，它极大地推进了飞行试验的进程。莱特兄弟使用这个风筝成功地进行了试飞，其后制造了基于这套机翼扭转控制系统的大尺寸滑翔机，足以搭载一个人。莱特兄弟在1905年将这架1900年制造的滑翔机原件连同一些垃圾一起烧掉了。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是按原尺寸制造的复制品。



中华经典有哪些？都讲了什么？（九）孟子的经典思想

文 江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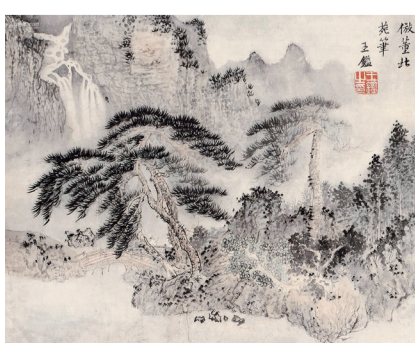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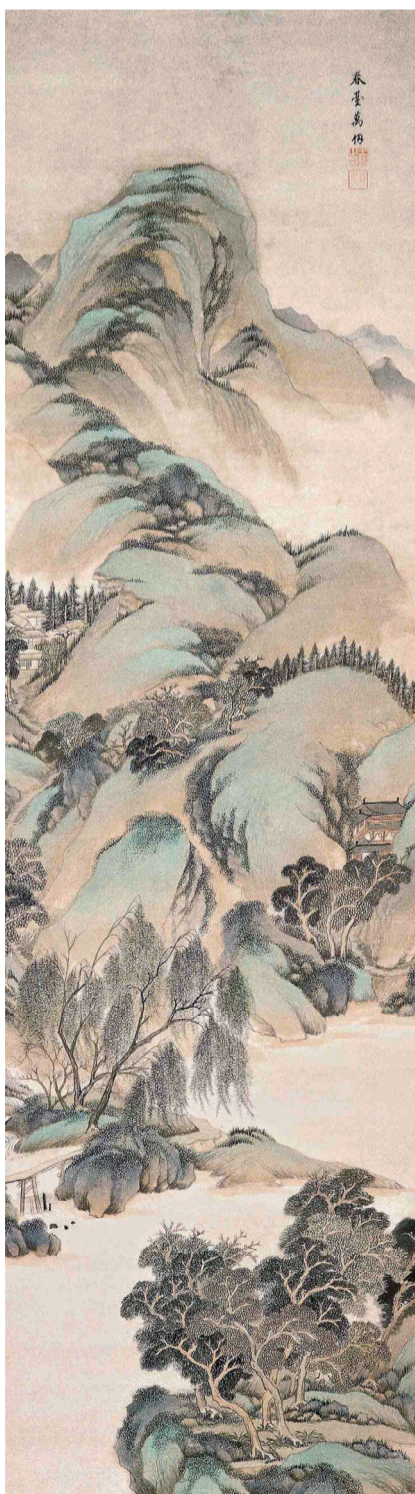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但两人有着一些不同的观点。孔子讲“仁”，孟子则讲“仁义”。孔子重视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视人生存的权利。对于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这件事，孟子就语出惊人。当时，邹国的官吏死了33人，老百姓却一个也没有死，而且百姓眼望着这些官员死去而不救助。孟子对邹穆公说：“活该！谁叫你和你的臣下平日残忍地对待老百姓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们的老百姓今天可找着报复的机会了！”这充分表现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义思想。他还主张“贵戚之卿”，可以废掉坏君，改立好君。这种思想，是孔子仁学的发展，在先秦诸子中是绝无仅有的。

对于君臣间的关系，孟子也比孔子思想更进一步。孔子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却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思想比后代那些愚儒、理学家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昧思想先进多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本源思想是很开明、民主的，不像后来朱熹等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们所宣扬的君臣、夫妻、父子的所谓伦理纲常之思想。

孟子还认为“道性善”，并且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所谓“性善”，其实是指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

孟子认为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不同的客观环境造就不同的人性，这是他很重视的一个观念。再有他认为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相传大禹懂得水性，所以治水能成功。孟子认为一切都有各自的客观规律，依客观规律办事，便是“行其所无事”而不“凿”。孟子讲“性”还涉及两件大事，一曰“食色，性也”，一曰“形色，天性也”。求生存和求配偶不但是人类的本能，也是其他动物的本能。

孟子还有很多思想具有超出他所处时代的先进性，对于今日也是很有借鉴学习价值的。天下理无常是，事无非常。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非定是非也。



故宫特展清初“四王”

王鉴：入手香光 力参董巨

文 侯晓轶

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翬和王原祁共同追随明代董其昌“南北宗论”山水绘画理论（实为崇尚南宗）。以摹古为法，重在提炼古人山水结构和笔墨构成形式。造成“四王”艺术趋同的主要原因是：“四王”绘画艺术沿董其昌理论一脉相承，另一原因是四人或祖孙，或师生，或同学关系，使得画风、审美追求非常接近。“四王”文人山水的艺术成就使他们成了清初中国文人山水绘画的一面旗帜，他们是典型的中国文人画家，亦官、亦文、亦画，家族世代为官且分别是当时文坛、政坛、画坛的领袖人物。王鉴祖父王世贞在万历年间官至刑部尚书，是当时文学复古运动“后七子”之首，一代文坛领袖。王鉴与王时敏同是董其昌亲授的学生，对继承和发展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的绘画理念功不可没。而且王鉴和王时敏共同培养了王翬、王原祁两个学生。

中国文人山水画到了清初“四王”可以说走到了极端的顶峰，形成了文人山水尚笔墨抒发，重士气、轻形质，

完全忽视澄怀味象和澄怀观道的山水绘画观念。“四王”使得文人山水绘画由“师古人、师造化”，走向单一的“师古人”，从古人绘画造型、笔墨结构中提炼出山水程式。程式化并不是他们的缺点，他们的问题在于提炼程式化的方式不是从自然山水中直接提取出来的，而是从古人作品中提取出来的。这样的绘画观念直接导致他们作品缺乏自然山川的生气，更造成后来的一些文人山水走向了完全的笔墨抒发和笔情墨趣。但“四王”的贡献是对历代大师审美构成的高度提炼，使中国山水画人走进了审美程式化的理性分析阶段，有助于启发后来者提炼整理中国山水绘画审美构成理论体系。

王鉴（1598年-1677年）36岁中秀才，先后在明末任左府都事、廉州太守，出身名门世家的他“不谙世事”，没干几年就因得罪上司被罢了官，清代建立前离就开了仕途。清建立后，当时的文人出任清廷是会被社会唾弃的，王鉴自然选择了既不出仕清廷也不反清的人生道路，做了一名退隐山

林的遗民画家。他和王时敏一样，一边与遗民交游，一边与降清的文坛领袖吴梅村、钱谦益等往来，成了新政权与前朝文人联系的纽带。不仅如此，王鉴和王时敏还培养子弟和学生读书仕进，以发挥文人家世在清政权的作用。成功地培养了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和他们的学生王翬步入清廷，王原祁和王翬在新政权中产生了极大影响，直接使“四王”艺术成为正统，以致影响了有清一代的中国山水画坛。

“四王”中王鉴与王时敏是同时代画家，他俩都是董其昌的学生。但二人心性的不同造成了艺术特点的区别，王时敏喜欢元人，尤其吸收元代黄公望的方法较多。而王鉴多以学习宋人董源、巨然山水技法为主，偶参元人王蒙一些方法为辅。宋人山水的特点是以致知格物为追求，尽量再现真山水的形象气质，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而元人山水虽不失一定的“应物象形”，但更加注重“自我表现”。故此，在画法上王鉴比王时敏更具精微之妙，王鉴更加注重山形的多变，树木的姿态。在王鉴的作品中山水多做崇山峻岭，山

石取圆浑之势，矾头多置山顶，墨色润泽，层层皴擦、烘染，使画面厚润华滋；树木画法多变，不仅见笔墨功力，更见姿态情志，这些特点完全来源于宋董源、巨然。相比之下王时敏山水造型简单，更重笔墨抒情和心性的表现。但大家一定要明白二人仍是模仿古人，只是一个重宋人式的“再现”类型的山水，一个是突出元人式的“重表现轻形象”绘画表达而已。二人作品充满古意，笔墨结构有序规整，但缺乏真山真水的生动气质，但笔墨追求精妙，注重提炼程式化结构。

王鉴是“四王”中最善青绿设色一体山水的，他的青绿山水上溯唐人方法，下取元人丘壑形象。他60岁所作《青绿山水卷》是一幅极佳之作，他融赵孟頫《鹊华秋色》和黄公望《浮岚暖翠》为一炉，极具装饰效果，色泽较为靓丽，然在绚烂中充满平淡、安静的气息。其用墨浓润、树木苍郁而简约概括，丘壑深邃而不琐碎，非常和谐、完整。晚年的王鉴绘画力追董、巨画风，形成了自己苍厚、华滋、沉雄、古逸的风格。

